

---

---

# 晚明坊刻明别集评点本考论

杨宜师

**内容提要** 晚明商业出版中产生了一批由书商书坊刊刻的明代别集评点著作。因流通中发生的改写、翻刻等情况，这些评本时常存在“一书多本”现象。在评本制作环节中，书商从对别集的选择到“增添”“删削”的编刻方式，都充满了谋利的考量。在对阅读主题的呈现上，坊刻别集评本也充分利用各体裁特征，以“奏疏+评语”的方式讲解本朝人物故事，以“名家诗文+评语”的方式提供文学知识，以“时兴小品文+评语”的方式展示旅行游记等文化信息，迎合了晚明底层文人读者的阅读消费需求。总体来看，书坊生产的这类别集评本自身的“经典”属性已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坊肆书籍的“时俗”特征，这是晚明大众阅读文化繁荣的具体表征。

**关键词** 晚明书坊 别集评点 一书多本 评本制作 时俗阅读

在晚明社会，评点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书籍编纂与出版方式。晚明书坊曾产出大量的评点书籍，其目标读者是底层文人群体。而大众阅读的兴趣与方式，正是明代书籍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主要包括两个分支：一是南宋古文评点、刘辰翁系列评点在晚明的传播研究；二是以更大体量存在的明人评点研究。对于后者的研究，长期以明人评点《诗经》《史记》《世说新语》等经、史、子部古籍与《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曲作品为重点，即便涉及集部著作，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楚辞》《唐诗选》等总集上<sup>①</sup>。相比起来，由晚明书坊刊行的明人评点明别集，是目前较少被注意到的一批文献材料。

坊肆明人评点别集分为明前别集和明别集两种。前者中，评者与别集作者多为最富盛名的诗文大家，如李梦阳评《孟浩然诗集》、郭正域评《杜子美七言律》、茅坤评《欧阳文忠公文钞》等，这类评本的商业价值源于别集自身的文学经典属性，评语也以传统文法批评为主。与之对比，后一类明别集评点并非出于“贩卖经典”的目的，这些评本虽多署名名家品评，但实际主导者大多是书商。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用娴熟的商业模式制作别集评本，并在这类雅文学作品中提供当时社会流行的阅读话题，以满足底层文人的购书喜好。从这一角度来看，探究和讨论明别集坊刻评本的制作、流传和接受等问题，对增进晚明图书出版文化的微观认知具备一定价值。

---

<sup>①</sup> 关于明人坊刻评点的研究，参见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潘建国《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高津孝《明代评点考》“史书与评点”一节（潘世圣等译《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137页）、罗剑波《孙鑛〈楚辞〉评点及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3期）、胡琦《词章趣味与经典重置：以〈檀弓〉批点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等。此外，余祖坤《古文评点向清代别集的渗入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李由《商业化运作与南宋古文评点的演变》（《文学遗产》2021年第4期）两文对评点与商业出版的关系有专项探讨，也值得参考。

## 一 一书多本：明别集坊刻评本的版本流变与实态

晚明书坊生产和刊行的明别集评本，除传统界定的别集外，还包含一部分别集丛编评本。虽然在今天看来，后者应当归属于总集类目，但它们均以作家个人别集为装订刊刻单位，在评点旨趣和传播路径方面也与传统别集评本无异，因而也须纳入讨论范畴。依据以上标准，检索明代文献目录和丛书，可统计出现存明别集坊刻评本至少有如下三十五种<sup>①</sup>：

[表1] 现存明别集坊刻评本

评本类型		现存评本
明别集单刻评本	书商伪托名家评点	<p>1. 署名李贽评点： 《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首一卷； 《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卷，《附录》一卷；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四卷； 《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二十卷； 《张文忠公奏疏抄》四卷； 《李卓吾先生批选赵文肃公文集》四卷； 《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p> <p>2. 署名徐渭评点： 《徐文长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 《徐文长评于节闇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诗集》三卷； 《徐文长评选杨椒山集》四卷。</p> <p>3. 署名锤惺评点： 《王文成公文选》八卷； 《刘文成公全集》十二卷。</p> <p>4. 署名袁宏道评点： 《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四卷； 《徐文长文集》三十卷。</p> <p>5. 署名汤宾尹评点： 《新楔会元汤先生批评空同文选》五卷； 《新楔会元汤先生批评沧溟文选评林》五卷； 《新楔会元汤先生评林弇州文选》四卷； 《新楔会元汤先生批评南明文选》四卷。</p> <p>6. 署名王世贞评点： 《评林新楔甌甌洞稿文类》二十卷，《诗集》六卷。</p> <p>7. 署名屠隆评点： 《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p> <p>8. 署名祝世禄评点： 《石林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p>

<sup>①</sup> 有三种明别集评本暂不列入统计：1. 署名谭元春评点释慧秀《谭友夏先生评订秀野轩集》十二卷，此集实无评语；2. 陈嘉兆、丁允和评点陆云龙《翠娱阁近言》四卷，此集虽由书坊峥霄馆出版，但具备私家评点性质；3. 沈际飞评点汤显祖《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三十卷，目前暂无法确定沈际飞是否为书商。

续表

评本类型		现存评本
明别集单刻评本	书商评点	《宗伯集》六卷; 陆云龙评《翠娱阁评选锺伯敬先生合集》文十一卷,诗五卷,《附录》一卷。
	文人评点,书坊刊印	周饴评张明弼《评琴张子禅粟林》二卷; 张采、周钟评张溥《七录斋集》六卷,《论略》一卷; 朱之臣评杨鏞《生绿堂文集》六卷; 潘拱宸评茅坤《茅鹿门文集》八卷; 谢廷赞评黄道周《骈枝别集》二十卷。
明别集丛编评本		署名李贽评点《三异人集》二十二卷,《附录》四卷;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大家文集》二十八卷; 署名徐渭评点《三异人文集》二十三卷; 署名汤宾尹评点《四大家文选评林》十八卷; 署名李廷机评点《新刊翰林批选三先生文粹评林》(卷数不明); 陆云龙评《皇明八大家集》十六卷; 陆云龙评《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

上表所列的明别集坊刻评本中,有一部分存在因版本流变而出现的“一书多本”情况。晚明商业出版中,经常因改写、翻刻、分散流传等因素而导致同一种书籍出现文本变貌。郭英德先生最早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中以“一书各本”来概括这种外在版刻样式和内在文字旨意存在差异的现象。明别集坊刻评本与通俗小说的传播环境相近,因此也有类似现象。但较之后者“不同版本正文文字内容歧异纷呈的复杂情况”<sup>①</sup>,明别集评本的变貌只是更改了署名或者是图书的外貌样式,故而以“一书多本”稍作区分。在书籍流通领域,其最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是由丛编本刊行逐渐演变为各种别集分别刊行;二是卷数、版式有所调整的坊刻本取代原有的私刻本。

“明别集丛编评本”中多存在第一类情形。署名李贽评点的《三异人集》为其中典型代表,其余如同署名李贽评点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大家文集》《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张文忠公奏疏抄》《李卓吾先生批选赵文肃公文集》,署名汤宾尹评点的《四大家文选评林》《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空同文选》《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沧溟文选评林》《新锲会元汤先生评林弇州文选》《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南明文选》,也存在丛编本与单行别集在流通过程中的分合关系。《三异人集》二十二卷、《附录》四卷是万历书商俞允谐刊刻的方孝孺、于谦和杨继盛三人诗文集合集,署名李贽辑评,现存明俞氏求古堂刻本。该丛编评本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首一卷,《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卷、《附录》一卷,《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四卷这三种单行版本。丛编本《三异人集》二十二卷包括《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卷、《李卓吾评选杨椒山奏疏》一卷、《李卓吾评选杨椒山诗集》一卷、《李卓吾评选杨椒山文集》一卷,《附录》四卷为“李卓吾评方正学卷之一”“李卓吾评于忠肃卷之二”“李卓吾评杨椒山卷之三”“李卓吾评杨椒山卷之四”。三种单行本重新翻刻时,编订方式为《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将原《附录》“李卓吾评方

<sup>①</sup> 郭英德《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中,以《水浒传》的“文简事繁本”“文繁事简本”“繁简综合本”“腰斩断刻本”四类情况说明通俗文学的“一书各本”现象。相比起来,明别集坊刻评本中并没有如此复杂的版本变貌。

正学卷之一”列为卷首。《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将原《附录》“李卓吾评于忠肃卷之二”列为书后《附录》一卷，新《附录》卷端首行题“李卓吾评于忠肃”，删去原本“卷之二”字样。《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四卷四册，前两册分别对应《三异人集》中《李卓吾评选杨椒山奏疏》一卷、《诗集》一卷、《文集》一卷的内容，第三册收原《附录》“李卓吾评杨椒山卷之三”，第四册收原《附录》“李卓吾评杨椒山卷之四”，成为新的四卷本。由此可知，三种单行本都应是独立编纂、刊刻、流传的，而非从《三异人集》中直接分出，因此属于“一书多本”。此外，署名徐渭评点的《三异人文集》《徐文长评选方正学文集》《徐文长评选杨椒山集》《徐文长评于节闇集》四种，也是李贽评点《三异人集》的衍生版本。将明刻本《徐文长评于节闇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诗集》三卷（以下简称“徐本”）与明吴山俞氏文房本《三异人文集》二十二卷（以下简称“三异人本”），明刻本《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卷、《附录》一卷（以下简称“李本”）进行比对，三者版式相同，均为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卷内正文、评语、行间圈点及卷首署名“吴山俞允谐汝钦阅”均相同。但徐本较其他二本的区别有七点：1. 徐本卷前无序文，三异人本、李本卷前均有序。2. 徐本正文卷端题“徐文长评”，其他二本卷端题“李卓吾评”。3. 三异人本、李本版心上方书口处镌“李卓吾评”，徐本相应之处为空白。4. 徐本《奏疏》卷四首叶首行空三格题“评于节闇奏疏卷之四”，三空格处有刻字被删去的痕迹；三异人本和李本在此处为“李卓吾”三字。5. 三异人本、李本《文集》一卷中，目录与正文顺序不一致，目录最后一篇为《进龙马表》，而实际载文为《绿筠书舍记》；徐本目录与正文一致，其修改方式是将三异人本、李本第七叶《绿筠书舍记》作为第二叶，原页码“七”涂写为“二”，原第二叶页码改为“又二”。6. 三异人本、李本《文集》卷末均镌“李卓吾评于节闇文集终”字样，徐本无。7. 徐本较其他二本，每叶书口下多出刻字数目。结合此七点可知，徐本与三异人本、李本有密切关系，是署名李贽评点《三异人集》的衍生版本。至于徐本署名为什么会从“李卓吾”更改为“徐文长”，已有学者指出可能与万历时期官方禁毁李贽书籍有关<sup>①</sup>，但也不排除是受徐渭在晚明时期声名不断扩大的影响。

书坊对原私刻本的重新编刻，属于“一书多本”的第二类情形。万历时期，王学左派思想流行，署名李贽评点的王畿别集《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sup>②</sup>（以下简称《语录钞》）即有明万历间刻本，明万历间吴可期、吴可善刻本，明万历间尚论斋刻本，明苏州阊门刻本等四种版本。经比勘，四种版本版式均相同，卷端均题“新安后学吴可期、吴可善校正”，卷一首叶版心下方均有“秣陵杨应时书，梅仕见刻”的署名。由此推知，它们应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是在书坊中不断重印而成的。多种版本的存世证明了该书畅销的事实，但这部颇受欢迎的书籍并非李贽评点王畿文集的原书。实际上，万历二十七年（1599）何继高主持刊刻的《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才是真正的初刻本。何继高（1548—？），字汝登，号泰宁，浙江山阴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何氏与王畿为山阴同乡，均服膺阳明心学<sup>③</sup>。李贽《龙溪先生文录抄序》云“泰宁视龙溪为乡先生，其平日厌饫先生之教为深，熟读先生之书已久矣，意欲复梓行之，以嘉惠山东、河北数十郡人士。……而命予圈点其尤精且要者。”<sup>④</sup>可知何氏刊刻文集并请李贽评点的动机在于宣扬龙溪学术，但

<sup>①</sup> 参见梁容若《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李贽于万历三十四年在通州下狱自杀，著作被禁止，书贾才改头换面，假徐文长之名以便销行。”（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81页）

<sup>②</sup> 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龙溪语录》八卷”条“是编虽名语录，实即畿之文集，前有李贽《序》，谓之《龙溪集钞》，盖又经费所品定也，合是二人以成此书，则书可知矣。”（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588页）

<sup>③</sup> 参见陶望龄《歇庵集》卷一〇《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何继高）后官南京，讲学定林，明心性之说。”（张昭炜主编，李会富编校《陶望龄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中册，第593页）

<sup>④</sup> 李贽《李氏焚书》卷三《龙溪先生文录抄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集部第140册，第257页。

后世书目对此本缺乏记载，如《四库全书总目》就仅存《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而不录九卷本。两书存世版本的多寡说明，应是在原九卷本获得社会关注后，书坊迅速捕捉商机，多次重复刊刻并发售，价格低廉和较易购买的优势使得坊刻本逐渐取代初刻本，成为了通行版本。此外，崇祯十五年（1642）刊刻的《石林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与《语录钞》也是“一书多本”的关系。石林是祝世禄（1539—1630）的别号，世禄字无功、延之，江西德兴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南尚宝司卿，师事耿定向，万历末曾在徽州、南京讲学。该书署名从“卓吾先生”改为“石林先生”，应当仍与李贽书籍禁毁有关。王畿别集评本先在万历时期被书坊重复刻印，再到崇祯时期改变署名后继续刊刻出版，《语录钞》系列版本真实还原了“良知现成”思想在当时的流行度。

除讲学书籍外，提供学识信息的别集评本也是书坊热衷刻印的种类，同样存在“一书多本”的第二类情形。以《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为例<sup>①</sup>，该书的初刻本是王穉登《谋野集》十卷，由郁文周私家刊刻，无评点。郁文周，字文叔，南直隶江阴人，出身望族，与王穉登交好<sup>②</sup>，万历间官至福建长乐知县，后以疾去职，卒于家。《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是书坊在郁氏十卷本的基础上重新编选并伪托屠隆评点的新的王穉登别集读本。此坊刻评本一经问世，便颇受欢迎，因而也被多家书坊重复翻刻，成为流行度最高的版本系统。以现存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书林熊稔寰刻本、明程德符刻本、明熊云滨宏远堂刻本及明溧阳张氏学钓亭刻本四种版本为例<sup>③</sup>，它们的行款版式均为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眉上、行间镌评，正文和评语也都相同。细微区别在于：1. 熊稔寰本，无鱼尾，无栏线，双节版，有眉栏，卷首有屠隆《谋野集序》，卷四末镌“万历丙辰春正月，书林熊稔寰重梓”牌记。2. 程德符本，单鱼尾，无栏线，版心镌“谋野集”，卷首有屠隆《评释谋野集题辞》、冯时可《谋野集序》、郁文周题辞，卷四末镌“新安程德符甫校梓”。3. 熊云滨本，单鱼尾，无栏线，封面镌“镌屠赤水评释，宏远堂熊云滨重校梓行王百谷《谋野集》”，卷首有屠隆《评释谋野集题辞》。4. 张氏学钓亭刻本，书名为《新镌赤水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单鱼尾，双节版，有眉栏，封面镌“屠赤水评释王百谷《谋野集》，溧阳张氏学钓亭重梓”，版心镌“评释《谋野集》”，卷首有郁文周题辞。可见，《屠先生评释谋野集》系列版本也属于书坊不断重刻畅销书籍所导致的“一书多本”现象。

总体来说，明别集坊刻评本中的“一书多本”现象，再次证明了古代书籍流通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但较之通俗文学作品直接生成于坊肆，明别集坊刻评本的“一书多本”反映了在晚明印刷繁荣的背景下，原先常由官方或私家刻印的雅文学别集评本是如何被纳入书坊刊刻范围的。综合参照各别集评本的“一书多本”现象，可以对图书生产与流传的历史现场及其影响因素（社会潮流、图书政策、流通散佚等）有更清晰的了解。

## 二 趋名与增删：明别集坊刻评本的编刻策略

作为图书商品，明别集坊刻评本的出版目的是谋求经济利益。书商对如何制作一部受欢迎的别集评本有精心的考量，具体表现在选取评点对象和增删文本正文、评语等方面。

① 《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评语以注音释义为主，是一本提供学识信息的读本，参见后文考论。

② 蒋以化《纪郁文叔》：“文叔讳某，余邑宦族，占籍江阴，余羨其孝廉时绝不与家门琐尾，日受夫人廩饩半两为灯火资，文叔别无事，惟父子相对工铅槧而已，忽夫人捐背后，入长干觅秦楼丽人徐翩翩。”（《西台漫纪》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子部第242册，第106页）王穉登《答郁文升》：“足下佳儿佳妇且有贤孙，此世界独于文叔无少缺陷。”（王穉登撰，屠隆评《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卷三，明熊云滨宏远堂刻本，第17b—18a叶）

③ 王穉登撰，屠隆评点《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本文仅引用四种来源清晰的版本例证，分别为：1. 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书林熊稔寰刻本；2. 国家图书馆藏明程德符刻本；3. 国家图书馆藏明熊云滨宏远堂刻本；4.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溧阳张氏学钓亭刻本。

书商以何种标准选择其所要刊刻的别集？综观现存评本，可知大多是公卿名臣和文坛才士的别集，但也存在如杨锵《生绿堂文集》等次要作家的别集。检索相关书序和周边信息，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脉络：万历时期是书坊刊印明别集评本的肇端阶段，首选最富声名的人物；发展至天启、崇祯时期，选取范围更趋广泛，凡有一定名声的明人，其文集皆可能被书坊刊行。

坊肆刊刻明别集评本，最先选择的是“忠”“文”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基、方孝孺、于谦、王守仁、杨继盛、张居正、赵贞吉和杨慎、徐渭、李梦阳、唐寅、王世贞等一批名臣才士都有坊刻评本流传。已知刊印于万历时期的《三异人文集》《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大家文集》《四大家文选评林》《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徐文长文集》《屠先生评释谋野集》无一不属于此类情况。书商的选取动机在于，这类人物具备最广泛的读者基础，社会对于他们的精忠节义和文学才华十分崇拜。其中《三异人集》和《徐文长文集》更以“异”作为卖点，前者所收《皇明三异人传》序云“三人从容不屈以死，是之谓真圣贤、真佛菩萨、真名士，二百年来罕生三异人，诚前古所未有也。”<sup>①</sup>后者序云“古之异人不可胜数，予所知当世如桑民悦、唐伯虎、卢次楸与山阴之徐文长其著者也。唐、卢俱有奇祸，而文长尤烈。”<sup>②</sup>两序强调了别集对象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书商借其旷世忠义之异或经历遭遇之异，吸引读者消费。稍后的启祯时期，陆云龙评《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朱之臣评杨锵《生绿堂文集》等更多文人别集进入书坊刊印的范围，这一转变的原因虽没有直接文献材料可供说明，但大致应是出版图书种类增多、竞争扩大所致。崇祯书商陆云龙的一则广告启事于此可作旁证：

- 一、刊《行笈二集》（征名公制诰、奏疏、诗、文、词、启、小札）。
- 一、刊《广舆续集》（征各省直昭代名宦人物）。
- 一、刊《续西湖志》（征游客咏题嘉、隆后杭郡名宦人物）。
- 一、刊《明文归》（征名公、逸士、方外、闺秀散逸诗文）。
- 一、刊《皇明百家诗文选》（征名公、逸士、方外、闺阁成集者）。
- 一、刊《行笈别集》（征名公新剧、骚人时曲）。
- 一、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

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陆云龙《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征稿启事”，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崇祯六年[1633]崢雷馆本）

此则启事兼具广告和征稿的双重目的。从小字征稿内容可以看到，在崇祯时期，陆氏书坊刊印明别集的范围已扩展至名公、名宦、逸士、方外、闺秀等更广泛的群体。或许在存世文献以外，明末的出版市场上还有更多明人别集评本在出售和流通。

选定刊刻对象后，书商便开始编刻评本。在此环节中，伪托名家评点的别集评本最具备研究价值。晚明伪刻风气盛行，时人记载“书坊假中郎名刻书甚多。”<sup>③</sup>“但借名字，便尔称佳。如假卓老、假文长、假眉公，种种诸刻，盛行不讳。”<sup>④</sup>现存署名名家评点的评本大多是此风气下的产物<sup>⑤</sup>，它们的实际操作者是文学水平一般的书商。书商出于谋利的目的假托时贤评点，并在具体制作过程中运用“增添”和“删削”这两种方式：一是增加书本的附录内容或从他书摘抄评语以呈现丰富的卖点；二是删

① 转引自谢国桢《江浙访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② 黄汝亨《徐文长文集序》，徐渭《徐文长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5册，第4页。

③ 袁中道撰，步问影校注《游居柿录》卷一〇，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④ 醉香主人《题卓老批点〈西厢记〉》，吴毓华编著《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⑤ 关于晚明坊刻本作伪的事实，学界已有广泛共识，其中徐艳《关于〈徐文长文集〉评点的真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2期）是唯一一篇考证坊刻别集评语实系伪托的论文。

略原集正文和评语。

“增添”的方式之一是为评本正文添加附录，包括两种做法：第一，将评本与作者其他书籍合刻装订，如署名袁宏道评《徐文长文集》与徐渭《四声猿》合订，《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与唐寅《唐六如先生画谱》合订，周鏊评张明弼《评琴张子禅粟秣》与张明弼《琴张子萤芝集》合订等。第二，在评本内附录关联性信息，常见的做法是添加传状、年谱等内容，现存有七种评本属于此类型：1. 《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首一卷（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首一卷中载陈纪《正学先生事状》、陈建《粤滨逸史》、王世贞《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兴记》等十三篇文章，均有夹评。2.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四卷（天津图书馆藏明刻本），卷三收《杨继盛自著年谱》，卷四收王世贞《杨忠愍公行状》及徐阶《杨椒山志铭》，均有夹评。3. 《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卷、《附录》一卷，《附录》列《太傅于忠肃公》《授命诗》及张锡《赞》，均有夹评。4. 《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卷前有“万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后学温陵李贽闻”（此部分为李贽《续藏书·理学王公》节选）、“附卓吾先生《与焦弱侯书》”（此部分为李贽《焚书》卷二《复焦弱侯》节选），无评点。5. 《王文成公文选》八卷（明崇祯六年刻本），卷七收《王守仁年谱》，卷八收《年谱后录》，《年谱后录》包括《陆澄辨忠谗以定国是疏》《钱王诸及门等搜录先生征濠反间遗事》等文，有评点。6. 《徐文长文集》三十卷，目录后附陶望龄、袁宏道《徐文长传》各一篇，无评点。7. 《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四卷（明刻本），附录《传赞》《纪事》《外集》各一卷，《纪事》有评点。以上这些增添行为，目的是使评本内容更加系统和丰富，得以广泛售卖。

在“增添”之外，这类坊刻读本更重要的卖点在于评语。晚明托名作伪的书商自身的鉴赏水平往往有限，因此在自撰评语之外，还有从托名对象的其他著作中摘抄文字以生成评语的做法。坊刻本《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便代表了这种情况。此书署名李贽评点，评语在每篇文章之后另行别出，全书的尾评题识并不统一，有“卓吾子曰”“卓吾曰”“李生曰”“李卓吾复谗之曰”等多种，显示出坊刻不精的特征。而评语内容按照字数多寡和喻意深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如“先生真聪明，先生真盖世聪明者”“胆欲大之语，又胜志欲大语也。能欲多而事欲鲜，此语甚有病。能即事也，多能即是多事了，而一欲多一欲鲜，分而为两得乎”“可以见范公矣”<sup>①</sup>等浅白评语；另一类则是大段论述文字，如《孝烈妇唐贵梅传》一文李贽评语：

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于穷乡下邑，而不可行于冠裳济济之名区。只可行于三家村里不识字之女儿，而不可行于素读书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某非素读书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溪为县，又非毛某所产之巨邑名区乎？今通判贪贿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贵梅宁死而不受辱，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则先王之教化亦徒矣。

卓吾子又曰“孝烈”二字，杨太史特笔也。夫贵梅之死烈矣，于孝何与也？盖贵梅所以宁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岂其不切齿痛恨于贿嘱之商，而顾忍死以为之讳哉？书曰“孝烈妇”，当矣。（《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4册，第336页）

这篇原文记女子唐贵梅姿色秀丽，被徽州富商觊觎，后者伙同其婆母、县官逼迫其就范，最终致使唐氏自绝于古梅树下之事。李贽评语以县官“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与唐贵梅“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对比说明“先王之教化亦徒矣”的社会事实，揭露那些标榜仁义道德的士大夫虚伪的面目，以此抨击伪道学。这一大段品鉴文字较之前一类简短评语，更符合李贽“童心说”的思想主张。而两种体量不等、内容深度不一的评语并存于全书中，意味着这些内容很可能有书商自撰和从他书中摘抄这两种来源。通过考证，坊刻本《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中，《博南谣》《孝烈妇唐贵梅传》《樊敏碑

<sup>①</sup> 杨慎撰，李贽辑并评《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卷五《鼓刀中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4册，第375页；卷六《淮南子》，第379页；卷一二《范文正公》，第441页。

跋》《季文子三思》《去丧无所不佩》《陈恒弑君》《段善本琵琶》《文公著书》《经史相表里》《伯夷传》《食货志》《宋统似晋》《李涉赠盗》《封使君》《论诗画》《张僧繇》等多篇文章的尾评文字均与李贽《焚书》中的作品题名及内容重合。其中《焚书》李贽评《蜻蛉谣》一段文字，坊刻本中将其列为《蜻蛉谣》《博南谣》两篇作品的共同尾评。《焚书》中的《封使君》一文，坊刻本将原文末句“李卓吾复谑之曰：果哉怒骂成诗也！升庵此言甚于怒骂”<sup>①</sup>另行别出，标为尾评。这些都印证了该评点本确有书商从他书摘抄文字生成评语的情况。

在“增添”之外，书商还运用了“删削”的方式制作评本。在删减正文方面，仍以《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为例，将此本与《龙溪王先生全集》二十卷对校，可发现坊刻八卷本选录的文章内容大多有所删减，如卷一《冲元会纪》删去“己酉仲秋，先生偕绪山钱子携浙、徽诸友，赴会冲元，合凡百余人，相与絀绎参互，纪其语于左云”等背景介绍，《书进修会籍》删去末尾酬酢信息“二子其以此义申告与尔父兄子侄，相与服膺而弗替，庶几无负于作会之意”<sup>②</sup>。这些删抹内容大多属于原文中的次要信息。这种保留主干内容且不影响阅读流畅性的删减方式，应当是书商出于节省成本的目的而有意为之。在删减评语方面，以张采、周钟评点张溥《七录斋集》六卷为例，是书现存明崇祯刻本、明崇祯吴门童润吾刻本、金陵傅少山刻本三种版本<sup>③</sup>，其中崇祯本是私刻本，童本、傅本是坊刻本。将崇祯本和童本比对，二书版式体例均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童本中删去了崇祯本中论“情”和讨论创作技法的相关评语。如卷一《礼质序》删去周钟“从来论三礼废兴，无此深晓”“奋谈著作，不觉情至”“归本德行”三条评语，《太仓州志序（代）》删去张采“正议弘雅，足冠《一统志》，不为独系一邑也。篇中感慨曲折，悲作者之难、失者之易，苏子之记藏书山房犹不能及”“书之盛衰，其论弥高，其情（情）弥远”两条评语；卷二《贺鲁缝稿序》删去周评“清峻遥深，至此已极，然而无非情也”；卷三《国表序（代张受先）》删去周评“言情至此，破涕为笑”，《徐锡余稿序》删去周评“字必妍练，复有至性，矫然而出”，《行卷菴露序》删去周评“善读善解，神情曲至”，《后场名山业序》删去周评“文字极锻炼，极隐博，然议正体弘，练不伤神，隐不失法”，《即山集序》删去张评“叙事兼议论，如诉如慕”；卷六《泰州崔侯碑记（代）》删去张评“义极严重，文极排宕，蔡王碑文，不得齐轍”，《论表策说》删去张评“安整该核”，《赠大理卿制（代）》删去周评“四六之文，贵议论，贵丰骨，非徒华美也。天如诸作仅以酬应，而声律清和，字句香洁，其思长，其骨古，便为韵言开辟，才真不可测也”<sup>④</sup>，等等。将以上这些删减的评语与被保留的“天如之文，强人气骨，正人学问，往往而然”“近日救荒，复有奇政，览此，信名篇足配巨”<sup>⑤</sup>等评语结合来看，可知书商在重刻时对评语做出了有意的区别对待。删略动机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为凸显张溥“尊经复古”的复社领袖身份；二是从更简单的出版谋利角度考量，可能仅是为了节约成本。

① 《李氏焚书》卷五《封使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0册，第331页。

② 参见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冲元会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8册，第251页；卷二《书进修会籍》，第288页。

③ 张溥撰，张采、周钟评《七录斋文集》六卷版本包括：1. 明崇祯刻本，参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903册；2. 明崇祯吴门童润吾刻本，附录《论略》一卷，参见《明别集丛刊》第五辑，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77册；3.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金陵傅少山刻本，附录《论略》一卷。

④ 《七录斋文集》卷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903册，第510—512页；卷二，第548页；卷三，第571、575、577、585、592页；卷六，第654、658—659页。另《七录斋集》卷四、卷五收录文体为寿序，童本保留了与论“情”有关的评语。

⑤ 《宋宗玉稿序》周钟评语，《王邑侯稿序》张采评语，《七录斋文集》卷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903册，第517—519页。

### 三 时俗阅读：明别集坊刻评本的当代文艺内容建构

在明代商业出版兴盛以前，别集作为名山事业，仅在文化精英阶层流行，他们互相品鉴文集，热衷于切磋文技与播扬文名，如谢铎致谢李东阳评点文稿时说“点铁有丹金可化，夺胎无地骨空饕。神交更在忘言外，何限繁芜待刈芟。”<sup>①</sup>孙绪评点马中锡文集时说“今三子之集俱在，试取而读之，有公之胸次乎？使公得列庙堂，虚衷融心，和鸣国家之盛，昌言远韵，当与李、杜、昌黎下上。”<sup>②</sup>随着晚明图书交易的繁荣，书商将更多文学书籍列入刊印计划，明别集评本便是其中一类。在雅文学文本和大众消费群体之间，书商找到了协调二者的方式，即结合评语，借别集中不同体裁的特性，建构大众读者喜好的话题，具体表现是选评奏疏、年谱、行状等体裁作品以形成讲史文本；选评名家诗文、尺牍以提供文学知识信息；选评时兴小品文以呈现旅游活动、书籍绘画、名人生平等流行文化资讯。

明别集坊刻评本的第一类阅读主题是讲述当代名人故事。明中期叶盛曾记“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sup>③</sup>，指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是当时社会大众热衷的阅读内容。书商迎合这一世俗爱好，在刊印小说戏曲之外，将目光投向堪为明人“言行录”的诗文别集上。前文已述，书商首选的别集刊刻对象是明代的名臣才士，而这些人物多具备传奇色彩。书商出版这类着重收录奏疏、年谱、传状等作品的别集评本，正是以主人公的第一手文章资料来满足大众了解名人生平故事的需求，这些作品往往详尽记录了作家参与的政治事件，兼具时效性和故事性。选定别集后，书商再添加浅白通俗的点评文字，原是雅文学的明人别集就变成了当代讲史读本，向大众读者呈现一段段情节生动的历史故事。

奏疏体裁是讲史类评本中最常见的作品形式。《三异人文集》卷首序云“忠肃力量最大，是第一等伟人。读其奏疏，不独救时，兼可垂后，可方陆宣公氏。”“忠愍之文不多见，即劾鸾、嵩二疏，上救荒一书，激切似贾生而力量过之，如梦大舜而知乐，因讲学而进俭，可方正学。”<sup>④</sup>说明了该体裁的政治垂训功能。现存评本中，《三异人文集》《张文忠公奏疏抄》《李卓吾先生批选赵文肃公文集》《王文成公文选》都广泛收录奏疏作品。以《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为例，该书卷一有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二文，卷末总评言“椒山以二疏遂得死所，亦以二疏竟得不死所”<sup>⑤</sup>，彰显疏文价值。《请诛贼臣疏》中，杨氏挞伐严嵩乱政云“臣观大学士严嵩盗权窃柄，误国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贼乎。方今在外之贼，惟胡虏为急；在内之贼，惟严嵩为最。胡虏者，犬羊之盗，疮疥之疾也。贼嵩者，门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贼有内外，攻宜有先后，未有内贼不去，而可以除外贼者。”评者于“严嵩盗权”处评“好货”，于“天下之第一大贼”处评“狠”，于“胡虏者”至“贼嵩者”处评“千古至言，更中时事”，用简明的语言痛陈诛杀严嵩的必要性。其后疏文继续描摹严嵩贪婪作恶的面貌，云“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络绎不绝，事无大小，惟嵩主张，一或少违，显祸立见。”“皇上罚一人，嵩又扬言于众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报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虽小心躲避，嵩亦寻别本带出。”评者于“事无大小，惟嵩主张”处评曰“段段画出一个叛贼来”，于“虽小心躲避”处评曰“可怜”，用通俗的语言渲染了权奸之恶；对于杨继盛讨伐严嵩的决心，评者亦

① 谢铎《桃溪净稿》卷二三《李宾之学士批抹拙稿赋此为谢》，《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册，第232页。

② 孙绪《马东田漫稿序》，马中锡《马东田漫稿》，《明别集丛刊》第一辑，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62册，第305页。

③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214页。

④ 李贽《题三异人文集引》，李贽辑《三异人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3册，第210页。

⑤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卷一，《三异人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3册，第345页。

通过对疏中“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屡示灾变以警告”句夹评“天上不肯饶他，椒山决不肯饶他”<sup>①</sup>加以附和。经由评语点缀，《请诛贼臣疏》从一篇严肃的伐文转变为对嘉靖朝忠直大臣锄奸故事的讲解，可读性和强烈的爱憎色彩均符合普通民众的阅读趣味。除奏疏外，讲史类别集评本也多选评年谱、传状、墓铭等类作品，与“奏疏+评语”异曲同工。年谱、传状等正文以时间轨迹记录历史事件的发生经过，评语则以世俗语、世俗情赏析讲解，二者组合亦具备讲史说话的功能，这类事例见于《王文成公文选》《徐文长文集》《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纪事》等评本中。总之，奏疏、年谱附加评语是明别集坊刻评本中的常见模式，正文如实记述当代历史事件，评语则给予精准恰当的评价，使得别集从巍峨的庙堂之文转变为市井讲史读本，从而满足大众读者阅读历史故事的爱好。

第二类阅读主题是提供文学知识信息。坊刻书籍的消费者多是底层文人，其中多数人的学识水平不高，迫切需要一些扩充知识储备的书籍。本朝文坛名家的诗文别集便成为天然的文学类学习范本。书商便对这类别集加以笺释、评点，使其成为畅销书籍。署名汤宾尹评点的《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空同文选》《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沧溟文选评林》《新锲会元汤先生评林弇州文选》《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南明文选》和署名屠隆评点的《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即符合这一特点。后者是现存唯一一部专收尺牍的坊刻别集评本。前文已提到，该书是《谋野集》十卷的商业选集。此本评少释多，评语多是对王穉登尺牍字音、典故的训释。卷首署名屠隆所作的《评释谋野集题辞》说明了成书经过和评释目的：

江阴郁文叔氏汇集而寿之木，属名《谋野》，叙甚悉也。荐绅先生、章缝髦士辈咸脍炙嗜之，业已甚播矣，第其援事博，寓旨深，人多未易解，譬之啐盘示儿，百物具在，虽悦于目，厥心茫如也。余雅好是集，适二三弟子时时问难，因暇拔其尤，订为四卷，择故实注其上，奥处益以训释，令观者不烦质究，一展卷而语意豁然，无复齟齬扞格之为患，如游五都市，珍奇百货弗眩其目，又若口尝九鼎，而滋味可勿问也。（《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序”，第1a—2a页）

序文表明，《谋野集》问世后便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作品文字较为深奥。新的选评本《评释谋野集》的主要作用就是“注故实”“训奥处”。换言之，四卷本实际上是原十卷本的阅读说明书。以卷一《答江鸿胪》评释为例：

《池草篇》葱倩如春烟，不减康乐西堂（眉评：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尝于西堂思诗不就，梦弟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神助）时也。江郎笔生花（眉评：李白梦笔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又江淹梦人授以五色笔），信然信然。仆画龙不灵，叶君但好其丹青（夹评：叶公子高好画龙，忽有天龙透窗，公怖甚，故云“但好丹青”，引喻妙绝）耳。足下过信叶君言，竿牍筐篚，俨然临之，谓能嘘气成云（夹评：喻画非真龙也，语本韩文）乎，误矣。左氏赋《三都》，得玄晏而重（眉评：皇甫谧号玄晏先生，左思赋《三都》，世人未重，谧有重名，乃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序，人竞传写，洛阳纸贵）。仆不敢当也。卧病羸（夹注：音驴，瘦也）劣，支离床间，日进食不半升，而喘如吴牛（夹评：吴牛畏暑，故见月而喘）不能已，笔札之役，秋以为期（夹评：句出《诗·氓》篇）。（《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卷一，第1b页）

《答江鸿胪》记王穉登推辞题序一事。此文用语简洁、辞气平和，仅有百字，却连续五处用典，彰显了作者的才华，但也形成了一定的阅读壁垒。基于此，坊刻本通过评语对全文进行详尽注释，使学识水平一般的读者借助评语也能快速掌握文意。这篇尺牍的评注准则也是全书评释体例的体现，《评释谋野集》这类评本正是通过评语的“知识化”注释讲解，为读者提供文学知识。

第三类阅读主题是提供潮流话题。晚明时期，短小隽永的小品文盛行，反映了当时社会求真求趣的审美新变。现存坊刻评本中，陆云龙编评的《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以下简称《十六名

<sup>①</sup>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卷一，《三异人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3册，第336—338页。

家小品》)是一部专收小品文的别集丛编评本,选录了屠隆、徐渭、袁宏道、汤显祖等十六人的小品文,每家各二卷,附以评语。编者陆云龙致力于通过选文和“予古人以心,予后学以眼”<sup>①</sup>的评语,展现丰富多样的阅读话题,其中便包含了旅游图册、书画资讯、名人信息等流行类别<sup>②</sup>。这些新颖的阅读主题虽然是目前坊刻别集评点文献中的孤证<sup>③</sup>,但对于探析晚明文艺风气而言,仍具备参考价值。

其一,《十六名家小品》堪称一部旅行图册。陆氏收录的十六家小品文中,包括多种文体,其中又以游记、书序、尺牍三种选文最多。对游记小品文的广泛收录,是为迎合当时的“卧游”风尚。游览山川美景是晚明社会的新风气,然而限于地理和经济因素,多数底层文人对于旅行往往是心向往之而身不能至,只好借助阅读游记,感受游玩乐趣,故谓之“卧游”。文编中,陆云龙在袁宏道、袁中道、文翔凤、王思任四家小品文中专列“游记”门类,选评他们代表性的纪游文章。其余各作家评本内也有相关选文,见屠隆《海览》《五色云赋》,汤显祖《匡山馆赋》《吏部栖凤亭赋》,虞淳熙《五岳胜览序》《云门游记引》,锤惺《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文翔凤《游莫愁湖序》,黄汝亨《岑山游记》《姚元素黄山记引》,王思任《天台评》,曹学佺《游武夷记》等。这些游记作品使读者拥有足不出户即可尽览山水秀色的便利。陆氏在每篇文章之后还有精彩的点评,例如评袁宏道《游华山记》云“著华之险,亦著游之趣。知退之痛哭尚未有得于游也。”<sup>④</sup>评袁中道《游西山记》云“绝是一幅江南好画图。”<sup>⑤</sup>评文翔凤《游莫愁湖序》云“历举江皋以神女名,支机石以织女名,温泉以太真名,并以文君,村以昭君,薛涛增浣花溪之重,西施增若耶溪之艳,金谷托绿珠不朽,虎丘以紫玉留声,方见莫愁可以重湖,典而核。”<sup>⑥</sup>评语就景观的自然、人文典故作进一步介绍,迎合了大众对游览山水的向往,令读者于卧游中目迷神驰,全方位感受旅行之趣。

其二,书序、题跋在《十六名家小品》中占据重要地位。首先,晚明思想解放,加之图书市场繁荣,使社会阅读兴趣渐趋多元。陆氏选评的书序小品文恰是一份晚明畅销书清单,包括屠隆《唐诗品汇选释断序》《少室山房稿序》,袁宏道《金刚证果引》《瓶花引》,汤显祖《王季重小文字序》《牡丹亭记题词》《邯郸梦记题词》《南柯梦记题词》,虞淳熙《徐文长文集序》《解脱集序》,袁中道《助道品序》《苦海序》《龙湖遗墨小序》,锤惺《二十一史撮奇序》《诗归序》《简远堂近诗叙》《隐秀轩时义自序》,黄汝亨《鸿苞序》《歇庵集序》,陈仁锡《藏书序》《续藏书序》《史记序》《汉书序》《三国志序》《奇赏自序》,董其昌《刘向说苑序》,王思任《屠田叔笑词序》《世说新语序》等。陆氏的点评,一为概括书籍内容,如评《诗归序》“去肤以真,矫狭宜远,易熟就生,当是诗诀”<sup>⑦</sup>,评《世说新语序》“《世说》一书,几令死吻复活,亦令闷胸欲开,化俗为文,转浅为蓄,文嫩为辣。刘

① 陆云龙《锤伯敬先生小品序》,《翠娱阁评选锤伯敬先生小品》,何伟然、丁云和选,陆云龙评《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8册,第292页。

② 需要说明的是,《十六名家小品》的选文和评语共同构建了一幅晚明社会百景图,除游记讲解、书画、名人信息外,还涵盖了时事政治、社会风化、士人修养及文学创作技法等方面内容。本文限于篇幅,只讨论三类代表性的当代潮流阅读主题。

③ 事实上,如果抛开“别集”这一界定外,晚明书坊中并非只有陆云龙一家刊评名家小品文,崇祯三年(1630)郑元勋编纂的《媚幽阁文娱》首开“搜讨时贤杂作小品而题评之”的风气,是编按体裁收录各家小品文,并于文后附评语(参见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初集》九卷《二集》十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册)。

④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袁中郎先生小品》卷二,明崇祯六年崢霄馆本,第2b叶。

⑤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8册,第677页。

⑥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文太青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8册,第245页。

⑦ 《翠娱阁评选锤伯敬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302页。

郎苦心妙手，功烈可铭千古”<sup>①</sup>；一为导读，如评《南柯梦记题词》“《鸿苞》一书，包括三教，四梦亦该括三教。《鸿苞》似为渐阶，四梦大启顿门。言幻言真，俱指南之车”<sup>②</sup>，评《助道品序》《苦海序》两文云“先掬以《苦海》，后掖以《助道品》，可令人名利之心欲轻”<sup>③</sup>。这些详细的书籍信息和阅读指示，可以有效激发读者兴趣，指导他们的购书和阅读，也可以使那些无力大量购买书籍的读者满足好奇求知的愿望。其次，陆云龙还在该丛编评本中提供了诸多绘画、书法方面的信息，见徐渭《画鹤赋》《与两画史》《八骏图叙》《纯阳子图赞》《书苏长公维摩赞墨迹》《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书马湘兰画扇》，李维桢《题杭景图》《书萧元戎女乐图》，黄汝亨《跋陈白阳阿房宫墨迹》，张鼐《叙同榜兄弟图》等文。陆氏文后也常附有导读评语，如评徐渭《与两画史》云“前是大局谱，后是小景谱，画家应以为诀。”<sup>④</sup>评李维桢《书萧元戎女乐图》云“集事之富，如粉白黛绿嫣然盈前。”<sup>⑤</sup>指引读者了解如何创作和鉴赏书画。

其三，《十六名家小品》还展示了丰富的当代名士资料，以满足底层文人读者对名人生平经历的好奇心。文编《总序》云“今读雨侯品下签，如与十六公晤对一堂，扬挖风雅，天盖不能终夺贫士权哉。”<sup>⑥</sup>即言明了编者的这项意图。以文编中对徐渭、黄汝亨两位名士的介绍为例：刻画徐渭形象，选徐渭《抄小集自序》、虞淳熙《徐文长文集序》、袁宏道《徐文长传》三文，向读者展示了徐渭坎坷的生平经历，陆氏评云“长公独帝词坛，文长几篡而有之，承拘冗之后，能打翻鸚鵡，踢倒黄鹤，诚未易才也。”<sup>⑦</sup>化用苏词典故<sup>⑧</sup>，感慨文长之不遇。刻画黄汝亨形象，则介绍黄氏于西湖之上建造游船“浮梅槛”的逸事。此游船绝妙处在于每年初春西湖梅花飘落时，船浮湖上，与落花融为一体，是谓“孤山梅英沾筏，筏与俱浮”<sup>⑨</sup>，成为士林美谈。陆氏选录黄汝亨《浮梅槛记》和虞淳熙《浮梅槛诗序》两文，评前者曰“自是韵事，何减苏公一苇”<sup>⑩</sup>，评后者曰“以二七小女郎驾浮梅槛，而歌竹枝鼓棹，应是天壤韵事也”<sup>⑪</sup>，可谓与读者共品名士风雅。此外，对于李贽、袁宏道、锤惺等存有争议的名人，陆云龙也自有一番见解。以李贽为例，对于官方禁毁李贽著作的举措，陆氏评袁中道《龙湖遗墨

①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王季重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339页。

②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汤若士先生小品》卷二，《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398页。

③ 《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665页。

④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徐文长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433页。

⑤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李本宁先生小品》卷二，《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484页。

⑥ 冯元仲《十六名家小品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155页。

⑦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267页。

⑧ 语出苏轼《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下片：“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鸚鵡，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册，第386页）

⑨ 虞淳熙《浮梅槛诗序》，《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272页。

⑩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黄贞父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561页。

⑪ 《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272页。

小序》云“文字亘古不磨，便消得以一生偃蹇偿之。然废其身，不能废其文，奈何？请以质媚嫉者。”<sup>①</sup>评陈仁锡《藏书序》云“但凭几句史书，个中埋没英雄多少，掩去奸雄多少，自须另出手眼，方为读史，又何惜世人之怪乎。信非真能信，疑亦岂真为疑，卓老亦自听之已耳。”<sup>②</sup>引导读者自主辨明是非。对于同样饱受质疑的袁宏道和锺惺，陆氏也分别选评袁中道《阮集之诗序》和锺惺《与高孩之观察》《与井陘道朱无易兵备》《与弟恮》等文章为其辩解。由此可见，陆云龙旨在通过选录名士小品文和附加评语的方式，为底层文人读者提供真实详尽的当代名人资讯。

综上所述，在作品内容呈现方面，坊刻明别集评本有别于传统别集评本言志缘情的经典主题，大量呈现讲史故事、文学知识、潮流资讯。这些主题反映了晚明底层文人群体的真实阅读诉求。对于他们来说，通俗性仍是审美与接受的主流特征。他们热衷于“精忠节义”和“才子风流”的历史人物故事，同时渴望阅读当代名家作品，还在社会新风尚中关注时兴的娱乐活动和文坛讯息。为迎合读者的这些消费需求，明别集这类雅文学文本被书商通过选和评两种手段，以更加通俗的面貌在图书市场中出版、流通，这是晚明大众阅读文化繁荣的标志。

## 结 语

明别集坊刻评本虽然是晚明坊刻书籍中的小众门类，但对于还原晚明出版史的真实情况具备参考价值。曾在出版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书商，因缺乏直接的文献材料，而在书籍史研究中处于失声状态，但他们制作的评本是展现其商业智慧的重要材料。作为不同于科举教材、小说戏曲的新兴出版物，坊刻明别集评本在以评语满足大众群体尚俗、尚浅的基本前提下，利用其“雅”类面向，丰富了底层文人读者的阅读生活。讲史故事类、学识读本类、文化资讯类评本都为读者带来了进阶性的知识与资讯。这既是书商为谋利而做出的选择，也是大众阅读水平提高的表现。同时，这也加强了底层文人读者与知识精英群体的精神连接，减少了二者身份差异所带来的信息隔阂，是晚明大众书籍文化的新特征。明别集坊刻评本的产生，证实了在晚明社会中，本朝作家别集曾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得到大众的阅读，这类原本由士大夫精英创作的雅文学文本，在商业出版中体现出“非经典性”的时俗内涵。这些事实表明，明别集坊刻评本应当是在印刷繁荣的背景下，晚明俗文学向雅文学渗透的产物。

[作者简介] 杨宜师，女，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马 昕)

<sup>①</sup> 《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668页。

<sup>②</sup>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陈明卿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第513页。